

重組杜甫的面孔： 從現代傳記到「心史」的回溯式閱讀*

黃自鴻**

(收稿日期：103年1月10日；接受刊登日期：103年4月25日)

提要

評論家從「詩史」、「以杜解杜」等理念出發，以為杜甫詩較正史更可信，可以按照他的作品重組生平事蹟及其所處之背景，充分展現出唐代安史之亂前後截然不同的社會氣象。本文擬從四種傳記要素出發，並從現代杜甫傳記的分析、正史列傳解讀和杜甫的自傳詩三個方面，重新審視杜甫傳記研究的問題。從自傳詩的角度看，杜甫〈壯遊〉以「狂」、「豪」及仕途失意總結自己的前半生，而在正史裡面，有關杜甫的資料雖然有待證實，卻仍然意在發掘一個狂傲文人的角色。由於寫作背景的影響和不同讀者群的需要，現代學者撰述杜甫的一生，同樣根據一千四百多首「心史」為底本，卻考掘出迥異的面貌。若試圖從「心史」理解杜甫，狂豪與悲慘人生應是落墨的一環。

關鍵詞：杜甫、傳記、心史、悲憤詩類型、〈壯遊〉

* 本文蒙兩位隱名評審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分析傳記的四種角度

杜甫（712-770）傳記汗牛充棟，既因為「詩史」稱譽、現代中國的現實主義思潮得到充分發揚等種種原因以外，也因為杜甫著作豐富，可謂一時代之「心史」，¹評論家咸認為可以按照他的作品重組生平事蹟及其所處之背景，充分展現出唐代（618-907）安史之亂（755-763）前後截然不同的社會氣象。同時，傳記式的研究角度一直被視為「正統的」、「科學的」方法，廣獲採用而著述甚廣。

從兩《唐書》的杜甫傳開始，有關杜甫生平經歷的各種爭論即不斷展開，無論是「以杜解杜」、杜詩與歷史事實、思想文化的傳承等問題，都引起各種杜甫傳記的誕生，也有學者視杜詩為自傳，說明杜詩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和意義。²目前以杜甫傳記為題的論文，多集中討論個別現代傳記作品的方法和得失，³本文擬擴闊現有研究基礎，從外緣到內緣的研究資料，即現代杜甫傳記的分析、正史列傳解讀和杜甫的自傳詩三個方面，以「杜甫作傳主的完整傳記作品」為探討對象，重新審視杜甫傳記研究的問題，指出現代傳記的撰述角度、正史〈杜甫傳〉的價值和詩聖賦予自己的首要屬性。由於以上各種傳記（自傳）

¹ 「心史」之說，較著名的有吳偉業（1609-1672）、黃宗義（1610-1695）的看法。吳偉業認為杜詩「史外傳心之史」，而黃宗義進一步指出「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浦起龍（1679-1762？）更以為，杜詩能指出史筆未到之處：「代宗朝詩，有與國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憂之；史不言朝廷輕儒，詩中每每見之。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蹟，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若拈了死句，苦求證佐，再無不錯。」詩歌與歷史的關係，不僅止是以社會背景或歷史興亡論證詩歌的特質，詩歌不但可以補充歷史所闕，更能反映一時代詩人的精神層面，是一種有個人色彩的歷史事實。見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且樸齋詩稿序〉，載《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60，頁1206、清·黃宗義：〈萬履安先生詩序〉，載《南雷文定》（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卷1，頁11、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首，頁63。

² 謝思煒：〈論自傳詩人杜甫——兼論中國和西方的自傳詩傳統〉，載《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17、川合康三（KAWAI Kōzō,）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頁161-163、〈杜甫詩中的自我認識與自我表述〉，載陳文華主編：《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81-94。

³ 柳存仁：〈讀洪煨蓮著杜甫傳〉，載《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669-1684、楊承祖：〈杜甫傳記研究中的畸變〉，載林天蔚、黃約瑟主編：《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之二》）（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年），頁81-90、錢志熙：〈均衡地作用——讀馮至先生《杜甫傳》的一些體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1994年），頁34-35、55、左漢林、趙志強：〈論杜甫傳記寫作的新方法與新角度——韓成武先生《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讀後〉，《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6卷6期（2004年11月），頁19-21、李芳：〈英語世界中的第一部杜甫傳記——弗勞倫斯·艾斯庫的《杜甫：詩人的自傳》〉，《新世紀圖書館》2007年卷3期（2007年5月），頁81-84。

的形式不一，意圖傳遞的傳主形象各異，下文嘗試提出一種傳記的「回溯式」閱讀，經由最貼近現代讀者的解讀材料，逐步回到似乎充滿偏見的古傳記，和作家夫子自道的個人形象，比較「形象」和「印象」的異同。

自新批評以來，作家傳記於文學研究方面的作用逐漸受到質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可算是韋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沃倫（Austin Warren, 1899-1986）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該書有專章談及文學與傳記的關係，認為傳記有評注上的價值，亦有助了解作家藝術生命的起伏，或與其他文人交往的情況，卻不能幫助讀者研究作品。⁴爾後結構主義、讀者反應理論、後現代主義等文藝思潮，更加速了傳記方法的衰落，進而質疑過往歷史與文學之間聲稱密不可分的必然關係。即便如此，杜甫及其作品的情況，較其他作家更為複雜。傳記似乎是最能配合「詩史」的一種著述體裁，傳記作家和研究者強調它重視真實，借以建立鮮明可讀的傳主形貌。⁵過往，正史列傳記述杜甫餓死、永泰二年（766）暴卒和論事不切實際，它的真確性不斷遭後來熱情的文人和學者所否定，現代學者根據「現實主義」等理論基礎和西方傳記方法的引入，從而撰寫出多部既講求歷史事實，也追尋傳主內心世界的複合物。

傳記的形式與意義，有賴於外在的「歷史背景」和內在的「傳主形象／自我」，與「事實」和「虛構」四種角度。傳記或自傳都必須展示傳主的形象與個性，趙白生（1964-）《傳記文學理論》指出，傳記裡的事實與一般歷史著作裡的事實不同，傳記最終的目的是重組一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傳主，而不是纖悉無遺地羅列有關這個歷史人物的事實。不少傳記作者，在意的未必是傳主豐功偉蹟的記述，而是能顯示人物性格的證據或軼事。相對於傳記，自傳的軸心是自我，作家回溯自己的一生，重點在於事實的詮釋和自我的演進，

⁴ 作者指出，傳記研究似乎可以有助說明寫作詩歌時的實際情況、探索作家本人的道德、智慧等內在興趣（intrinsic interest），以及能有系統地考析詩人及創作的心理狀況。韋沃二人對傳記研究的「正統性」提出兩個疑問：傳記作者的素材主要來自詩人的作品，可靠性確實存疑。其次，閱讀這些傳記對理解作品並沒有很大幫助。用科學探究的方法考察作家生平，研究者可能只找到瑣碎的生平事實，無益於作品賞讀，盲目從作品中搜尋材料，根據虛構的陳述，從而推論作家的生平，則只能撰寫出像傳奇小說的東西。一部作品，不單是作者個人的心理呈現，還受到文學的傳統和慣例所影響。文學作品更像是作家的「夢」，或是隱藏真實面目的「面具」。見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p. 75-80; 中譯參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頁68-74。

⁵ 古往今來的評論家，承認杜甫、作品與作家生平的緊密關係，例如孟榮（生卒不詳，875年進士）《本事詩》，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葉嘉瑩也認為：「杜甫是一位真正寫實的詩人，他的一千五百首詩中有相當一部分反映的是他現實的生活：無論國事還是家事，他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我們重新建立杜甫的歷史就比較容易了。」藉杜詩重現作者的個人生活，研究者將杜甫作品視為撰寫作者傳記的基本素材。見唐·孟榮：《本事詩》，載孟榮等撰，李學穎標點：《本事詩·續本事詩·本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8、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4。

建立與心靈的互動關係。如果作家希望營造出一個個性鮮明的傳主，他們必須糅合事實的真實和敘述的真實，確保與歷史相符，和前後一致的傳主性格。⁶而按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 1938-）的定義，「自傳」應該是一種強調「個性的歷史」的文類。自傳作家將內心回憶視為最核心的部分，通過重新的組織，使之成為一部個性的歷史。自傳的寫作，意味著在平衡解釋和回想之間、在自我的總結活動中認識自己。⁷以上所論自是閱讀或撰作傳記的常識，然而在杜詩和正史列傳的研究裡，這個法則似乎未有完全依隨，更多傾向於事實和歷史背景的注重。

現代人理解杜甫，建基於歷來學者充滿熱情的反覆探索。對杜詩愛好者來說，為偉人留下的人生片段重組臻聖之旅，自是充滿誘惑的宏圖偉業。貼近現代讀者的長篇傳記，按照「詩史」、「現實主義」和歷史分析的理論進路，引為研判杜詩與唐室命運起落的金針。在實際閱讀中，讀者特別容易找到事實、政治背景、社會聯繫的內容，而自我和傳主的性格，則多從「詩史」、「詩聖」的角度，重構個人成長與國破家亡息息相關的文化神話。相反，在杜詩學者眼中，正史遠不如杜甫「心史」般可信，原因在於當中細節的錯誤和詩聖形象的破壞，致令評論家全盤否定列傳的價值。應當注意到，歷來學者較少處理傳記和其他歷史、文學著作的不同，史臣何以將杜甫放在〈文學傳〉中，如何貫串那些未經檢核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對文人與文臣評價的不同看法。學者深信，杜詩集詩人自我、社會背景、歷史事實與藝術虛構於一體，自提出「以杜解杜」、「以杜證杜」的說法後，杜詩無疑是印證作者自我的首要素材，可以推翻與詩歌相悖的觀點。杜詩數量眾多，體裁及寫作風格各異，有極大（再）詮釋的空間，也因此虛構、事實、人物心理和歷史背景的分界有時並不明顯。⁸傳記作者以生命歷史的形式，定義理想中詩聖的主要特性，倒是所根據的素材，各篇詩作的寫作意圖（形式）卻無意間被忽略了。要撰寫杜甫的傳記，詩人的自傳作品應該是最直接的原始文獻，而辨明詩歌與自傳之間的差異，分析詩歌的自傳與虛構成分的不同，亦屬杜甫傳記研究必須處理的問題。人物形象無疑是傳記這種著述形式的核心和意義來源，藝術加工也是這種體裁所容許的法則。

「虛實內外」四方面是傳記的研究重心。傳記需要呈現傳主身處某個時代之下的悲歡離合和掙扎，在一個特定時空下顯現人物的個性和成長。中國正史特別強調歷史和人物的互相配合，列傳意在敘列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襯托其餘，呈現一段歷史的整體面貌。傳記的歷史屬性，令作者、讀者以及評論家更著重歷史事實和背景的一面，傳主性格，或者

⁶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5-8、22-26。

⁷ 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8-11。

⁸ 有關「合理虛構」的看法，參朱文華：《傳記通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25-230。

說是那些有爭議的形象，多數為研究者否定和忽略。相對於內外之軸，撰寫傳記著作，還要檢驗各種資料的真偽，以及詮釋作者的內心和用意。日記、詩歌、小說等第一手資料，記載的自是傳記的主要素材，而著述形式（文體）與寫作意圖則決定讀者的閱讀角度，為這些文獻添上虛構的可能，⁹傳記本身也存在各式各樣的虛構現象。

傳主經常因為性格的詮釋角度或是寫作意圖的影響而扭曲或變形，提倡傳記的溯源閱讀，比較各種形象的屬性是否一致，將可拼綴出平衡歷史與自我的傳記主人公形象，分辨合理虛構與偏離事實的現象。杜甫自然是現代人耳熟能詳的文化圖騰，各種現代思想影響我們的認識，就如後起之物覆蓋原來的底層。因此從表層開始發掘，我們將可分辨古今不同的著重之處，也可從各部傳記的「局部的真理」中梳理出傳主的一些首要屬性。

二、三種現代詩聖：強調社會背景的寫作變奏

一千四百多首杜詩既譽為「心史」，對於傳記作家來說，重構詩聖杜甫的一生似乎相對容易。一般杜甫傳記，為廣大讀者群提供基本「詩聖」面貌，或是綜合杜甫生平、杜詩發展及唐代社會狀況各方面，以期展現出符合「詩史」定義的畫卷。杜甫成長於「奉儒守官」的封建傳統，面對戰亂、苛徵雜稅和低下階層人民的艱苦生活，從困頓的長安十年開始慢慢過渡成為偉大的詩人，自始至終都沒有忘記國家和人民的境況，各部傳記的主要故事框架並無二致，似乎是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杜甫傳》作者馮至（1905-1993）就期望「極力避免使杜甫現代化，因為用現代人的思想與情感去點染將及一千二百年前的一個古人，可以說是一種難以原恕的罪行」，¹⁰然而《杜甫傳》正因為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影響它在當代的評價。下文將以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說明現代杜甫傳記裡的傳主形象，包括馮至《杜甫傳》，一部影響深遠的現代傳記；洪業（William Hung, 1893-1980）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第一部華裔學者的英文專著；以及著名傳記研究者朱東潤（1896-1988）的《杜甫敘論》，一部成於文革期間的著作。這三部作品都強調歷史背景的重要性，追求真實了解時代、作者和作品，卻折射出不同的面貌。

現代的杜甫形象，相當受益於五十年代馮至發表的《杜甫傳》。這部著作力求有根有

⁹ 即使是最接近傳主心靈真實的日記，作家也傾向在出版前修訂和潤色，刪去不欲公開的部分。同註6，頁80。

¹⁰ 馮至：〈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載《馮至選集》，卷2（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189。

據，以極為平實的筆調，敘述詩聖的生活和創作，以及在作品裡反映的事物。馮著是 1949 年後大陸第一部現代杜甫傳記，也由於文字流暢易讀、傳主個性鮮明等優點，允為杜甫研究或教學必須參照的對象。以後的杜甫傳記，如韓成武（1947-）的《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和莫礪鋒（1949-）、童強（1961-）合著的《杜甫傳：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都可看到馮著的痕跡與影響。¹¹

細節處理可以展示馮至如何理解詩聖的一生。在解讀杜甫家世與出身的影響時，作者認為父祖對於他的正面影響不多，倒是在〈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兵車行〉等作品中，杜甫因為仕途失敗和自身艱苦的生活，得以接近人民和認清時代的苦難，也促使詩歌藝術上超越了同時代的詩人。任職左拾遺之時，《杜甫傳》的傳主是一名謹小慎微的供奉官，只創作了些唱和詩和朝謁詩，後來被貶為華州司功，不再擔任中央官吏後的下層生活，才得以真正讓他成就不朽名聲。嚴武（726-765）死後，蜀中陷入戰亂，馮至認為這些詩作較史書更為真實，另一方面杜甫卻也曾經創作文句雕琢、內容空洞的應酬詩。¹²在馮至的認識中，杜甫的詩藝和生平的意義，就在於現實主義的發揚之上，安史前後的混亂政局和遭受肅宗（李亨，711-762，756-762 在位）疏遠等事件，都令詩人在創作上有了新的契機和發展。

在詮釋時代與自我的方面，《杜甫傳》認為李林甫（683-752）等奸臣專權，引致後來杜甫遭到投閒置散的命運，後來終於得到任職縣尉的機會，這卻是一個鞭撻百姓，「使一個有良心的詩人最難忍受的職位」，¹³似有意將時代壓迫與才德兼備的詩人作黑白分明的對比。在杜甫的一生中，為房琯（696-763）辯解，引起肅宗疏遠一事是子美仕途的重大挫折，馮傳指出傳主只看到房琯醇儒的一面，而沒有看到他不切實際的另一面。之後的三個多月，杜甫不斷舉薦賢能，也忠於自己的職責，令肅宗覺得他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人物，於是讓他回鄜州探望家人。¹⁴除了前述的細節處理外，杜甫在馮傳中經常成為作者稱道的傳主，卻也沒有樹立過度宏偉的形象。就如學者指出，「均衡感」是馮著給讀者的印象，¹⁵身處當時的政治氣候，作者自然難以迴避階級剝削、人民詩人等觀點，否定杜甫應制詩、奉和詩的價值。雖然如此，無論從五十年代的意識形態還是傳統文評的角度審視，作者都

¹¹ 韓成武：《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莫礪鋒、童強：《杜甫傳：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¹² 馮至：《杜甫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 11、56-60、65-67、91、94、174-175、180、205-206。

¹³ 同前註，頁 64。

¹⁴ 同註 12，頁 81-83。

¹⁵ 錢志熙：〈均衡地作用——讀馮至先生《杜甫傳》的一些體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1994年），頁 34-35、55。

能平衡兩方面的批評原則和觀點，這是《杜甫傳》的重要特色。最為馮至稱道的詩作是「三吏三別」，視乾元二年（759）是杜甫藝術成就最高的一年。另一方面，馮氏也運用大量語調猶豫的否定句，試圖闡明〈諸將五首〉和〈秋興八首〉兩組作品的政治意義：

這些詩裡不是沒有接觸到實際的問題，不是沒有說到國家的災難與人民的貧困，不是沒有寫出時代的變遷和自己熱烈的想望，可是這些寶貴的內容被鏗鏘的音節與華麗的詞藻給蒙蓋住了，使後來杜詩的讀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節與詞藻的迷惑與陶醉，翻來覆去地誦讀，而不去追問：裡邊到底說了些什麼？因此在解釋上也發生分歧。¹⁶

五十年代，馮至亦編有《杜甫詩選》，¹⁷序中雖然獨舉現實主義的詩歌，而上述兩組作品仍可發見其中，《杜甫傳》於當代杜甫研究仍有一定好評，正是因為這本傳記的「均衡感」。

華裔學者洪業亦於五十年代撰成英文專著《杜甫》，並選譯杜詩三百多首，重構杜甫的一生。作者自述，他的寫作動機是加強對這位中國最偉大詩人的欣賞，以及擴闊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民和諧的了解。洪傳強調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重視作品的寫作背景，以圖更加清楚掌握詩的內容，並將全部作品連繫起來。正是由於知人論世的閱讀角度，在作者的詮釋下，唐代由極盛走到中衰的過程裡李林甫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洪傳謂中國歷史學家咸認為重用李林甫是玄宗最大的錯失，為了永續自己的權臣地位，李林甫將不通文墨的武將安置在外，以絕「出將入相」的可能，卻直接引致安史之亂的後果。有關房琯問責一事，作者認為杜甫沒有意識到肅宗對房琯的反感，只著眼於執行拾遺（reminder）的職務，最後幾乎引來殺身之禍。不但如此，〈晚出左掖〉、〈春宿左省〉、〈奉答岑參補闕見贈〉諸作，確實可見杜甫盡忠職守的一面。就任華州司功參軍的始末和離職的原因，可謂詮釋杜甫生平的重點，論者或可從中發掘「儒家文人代表」的重要根據。洪傳基本同意失望棄官說，和一般論點的不同之處，在於杜甫的失望來自眾多的日常文書，還有考試工作不太順利。雖然他期望州內學生要留心時務，講求實際，但考試文章仍舊依樣葫蘆，根本無法真正考核人才，並據〈秋興八首〉「劉向傳經心事違」一句，解釋未能辦好華州的教育工作是杜甫離職的主因。¹⁸

另一個有關杜甫的細節是與嚴武的關係。洪傳指出，史書記載嚴武種種暴行的傳說，讓讀者很難將那個「睿智、公正和仁慈」的杜甫與一個殘暴的軍閥連繫一起，懷念一個曾

¹⁶ 同註12，頁181。

¹⁷ 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杜甫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¹⁸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9), pp. vii, 5, 47, 62-63, 109, 124, 142; 洪業撰，陳廣湘箋注：《我怎樣寫杜甫》（香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8年），頁38-39。

經想殺害自己的朋友也同樣教人難以想像。洪業相信杜甫擔任嚴武的軍事顧問，不單因為生活上的需要，也因為期待一位能人防止外族入侵。雖然此時杜甫可能因為嚴武禦敵成功的原因獲賜緋魚袋，最後卻因為受到同僚嫉妒、身體抱恙及懷念故鄉等原因，終於離開嚴武幕府的崗位。總括來說，杜甫於洪業而言是孝子，是慈父，是仁厚的兄長，是忠實的丈夫，是忠誠的朋友，是盡責的官員，不但是愛國的、好的也是充滿智慧的一個人。¹⁹

本書受到評論家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使用非傳記材料重組傳主生平，²⁰特別是提出新舊《唐書》中〈杜甫傳〉的錯誤。洪著亦嘗試考訂杜詩編年的問題，有些看法與傳統大異，頗有爭議。例如，作者認為〈去矣行〉應寫於 749 年，因為接受官職，表示杜甫本人放棄歸隱；接受了韋濟（生卒不詳，約與杜甫同時）的幫助後，洪業認為他放棄到東海的想法。又如〈壯遊〉，洪業指出本詩並無隱諱，應成於 762 年唐代宗（李豫，726-779，762-779 在位）登位以前。書的開首將杜甫與西方一眾偉大的名字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及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等作對照，不止是與這些西方經典相似，洪業進而強調杜甫是一個充滿獨特魅力的中國詩人。杜甫位列中國詩人首席，作者認為，歷代評論家建基於他最寬廣的同情心以及最高的道德原則，當然也因為他多元化的藝術技巧，與及其中深刻的現實性。眾所周知，《新唐書》有許多批評杜甫的段落，更指出傳主喜論天下之事，卻言過其實。洪業則認為杜甫適合擔當顧問之職，他的觀點既符合道德標準也有實用價值，只是不見容於當時。²¹

與上面兩部杜甫傳記相比，八十年代初朱東潤發表的《杜甫敘論》則可謂命途多舛。台灣學者楊承祖曾撰文批評《敘論》，認為朱氏既為傳記文學的研究者及奠基人，書中卻有大量考證、用字、觀點等存在大量錯誤和歪曲事實的地方，例如對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 在位）的評價極低，也不斷質疑杜甫是一個苟且偷生的懦夫。楊氏猜測，朱東潤的撰寫目的，可從郭沫若（1892-1978）《李白與杜甫》索解。《李白與杜甫》一反杜甫文革以前「人民詩人」的評價，視杜甫為地主與統治階級的喉舌，力圖重翻李杜優劣的舊案。朱東潤用極其違背常態的文字指責「最高統治者」玄宗，對杜甫也有不少失實描寫和不當用字，這是因為該書屬於一本「傷痕學術」的著作，意在控訴文革十年的浩劫。²²楊承祖主要從議論和史事考辨分析該書缺點；如果從篇幅和傳主塑造兩方面檢視，《杜甫

¹⁹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9), pp. 206-207, 282.

²⁰ Denis Twitchett,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s.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09.

²¹ 同註 19, pp. 1-2, 59, 161, 180, 257.

²² 楊承祖：〈杜甫傳記研究中的畸變〉，載林天蔚、黃約瑟主編：《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之二》）（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 年），頁 81-90。

敘論》確實讓大眾感到疑惑，這部著作似乎無法回應讀者的預期心理，既提供許多與杜甫無關的背景資料，也沒有幫助讀者更深入去了解傳主。²³

翻閱《杜甫敘論》，首先佔了不少篇幅的是有關李白（701-762）的對比、大唐帝國的背景、武后（武則天，624-705，690-705 在位）以及玄宗的分析。介紹杜甫家世及年輕時經歷的章節，卻指唐代的中央政府是「一個最大的高利貸者」。就如一般文革前後的杜甫專著所提出的，〈兵車行〉是子美詩風的一大轉變，然而朱東潤似乎並非意在閱讀傳主的心路歷程，而是借此抨擊玄宗窮兵黷武。同樣，第三章前半主要寫安史之亂，詳述當時的背景及重要人物等資料的評價，杜甫及其作品卻更像是為了印證玄肅父子無能而存在的。朱東潤為了強調古代社會的不文明景象，在第四章的開端，《杜甫敘論》就對杜詩「中興」一詞進行討論，質疑中國古代並無所謂中興。²⁴

從以上片段，我們可以發現《杜甫敘論》放進太多無關宏旨的議論，這本著作像是把杜詩作為理解（批評）古代社會的素材，以影射當時的統治者，反之「杜甫」的面孔卻極為模糊。林東海（1937- ）引述朱東潤的說話，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傳記文學的必要工作，朱氏意在評論杜詩的發展，因此沒有太多生平事迹，這點大概是該書沒有傳主對話的原因。²⁵我們卻應注意，書中間或使用場景、對話的段落，似乎無法充分營造所需要的效果。朱傳批評唐室為了獲得回紇的支援，財帛和青年男女皆歸對方一事是「對於人民的出賣」。也為了說明肅宗的昏庸，肅宗次女寧國公主（生卒不詳）遠嫁回紇一事，²⁶這個場景既與杜甫關係不大，參與其中的角色也只是傳中非常次要的人物，對推進整個傳記的敘述並無很大作用。

比較三部杜甫傳記，馮至筆下的杜甫，偶爾展現矛盾心境的同時，主線是組織一個現實主義詩人的形象，而洪業為了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最偉大詩人，意在組織杜甫的生平和思想，將傳主視為代表中國的詩人，甚至將所有美德都加諸傳主之上。有關傳主作品的發展過程，朱著大約與馮著接近，也認同 759 年是杜甫政治生涯的低潮，卻是一生創作的最高峰。與馮著同樣引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朱東潤卻以為「寒士」一詞具備階級意識，所持見解其實跟郭沫若相距不大，較符合當代讀者觀點的是〈秋興八首〉的分析。²⁷朱著時而顯得混亂的意識形態，讓讀者難以適應傳主變化不定的形象。

²³ 在另一部著作《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裡，朱東潤倒很強調傳主個性的重要性，見該書頁 9、12、125 等。

²⁴ 朱東潤：《杜甫敘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7、31-35、43-68。

²⁵ 林東海：〈朱東潤先生和《杜甫敘論》〉，載復旦大學中文系編：《朱東潤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1。

²⁶ 同註 24，頁 58。

²⁷ 同註 24，頁 82、106-107、154-156。

馮著和朱著受到寫作時代的限制，階級鬥爭和封建社會的連篇論述，無疑是這兩部作品最主要的「虛構」成分。杜甫形象和歷史背景的關係，看起來後者更屬於整部著作的核心，而不是前者的輔助說明。某程度上說，如果不是李林甫弄權和安祿山（703-757）割據，杜甫可能無法成為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現實主義詩人」當然是現代傳記的一種虛構手段。相比其餘兩部著作，朱著用了最多篇幅說明封建時代的黑暗事實，在「歷史背景」和「傳主形象」的軸線上向背景傾斜，幾乎沒有兩者的互動。馮至視時代為推動傳主的力量，朱東潤更進一步，理解傳記中的歷史背景等同傳記中的所有事實。

傳記與小說、詩歌等文學類型的差異，當然就在於前者強調事實的重要性。從上面三種著作來看，傳記卻不只於事實的陳述和傳主生平的重組，就如趙白生所言，傳記應該是一部部人物個性的歷史。按馮朱二傳的觀點，杜甫的作品應以「三吏三別」為巔峰，以後晚年創作都無法達到這樣的高度。現在看來，這種傳主自我的演進，對於詮釋晚期作品及思想方面顯得不甚全面，對李林甫弄權、安史之亂等歷史背景的強調，也確實是現代傳記「認識」杜甫的基本方式。

趙白生認為傳記作者大多出於紀念、認同等動機選擇傳主。紀念性的傳記試圖為逝者重塑紀念碑，這類型的傳記，不少是為了創造一個神性的理想人格，而「移情型認同」的作者出於相似的遭遇，敘述傳主生平往事的同時，也趁機抒發個人的苦悶與情感。「崇敬型認同」的作者，則因為對傳主權威人格的景仰，決定了作者只能撰述巨峰讓人嘆為觀止的一面，欠缺一種鳥瞰傳主的態度。²⁸洪著可算是兼具移情型與崇敬型特點的傳記，作者序中回憶自己的經歷，從小已經讀過杜詩並帶給他極大的震撼。1942年，洪業被日軍囚禁，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刻，他請求一部聖經及一部杜詩，卻遭拒絕。當時他覺得自己像是文天祥（1236-1282）一樣，並期待日後能夠更好的研究這位詩聖。²⁹洪傳認為一個有智慧而善良的詩人斷不會稱讚殘暴的軍閥，可以說，在洪業筆下，若非杜甫留下身後天下名，嚴武恐怕無法擺脫史籍中異常負面的印象，杜甫及其作品的神聖地位，於此可見一斑。³⁰洪業指出對時代、地點和背景的認識極其重要，³¹這種貌似強調社會背景的撰述手法，其實是傳主崇高形象的綠葉，為了「虛構」一位聖人誕生的必要工具。

²⁸ 同註6，頁121-130。

²⁹ 同註19，pp. vii；並參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著，馬樹德譯：《〈管錐編〉與杜甫新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203。

³⁰ 按李健的看法，中西傳記的不同處在於：中國傳統著重史的成份，不免側重傳主的背景和社會狀況，以及光明、神性的傳主形象。西方傳統著重人的成份，目的是為了表現人物內在的自我。中國式的傳記，因為與歷史的關係密切，因而有明顯的道德意義。見〈論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的「史傳合一」與西方傳記的「史傳分離」〉，《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2007年），頁84-87。

³¹ 同註19，p. 5。

正由於詩史稱譽、數量龐大的作品、長篇的抒情詩和關於自身極為仔細的描述，引致傳記作者多對史籍不抱信任態度。如馮至所言，雖然杜甫創作出許多名篇，當時的文學批評家卻不重視這些作品，更製造大量謠言毀謗杜甫，《唐書》杜甫傳的作者不察，把這些不符事實的內容收進傳中，以致後人產生許多誤解。馮至也認為傳記不應違背歷史，缺乏史料的地方只能任它空白。³²馮著最後回到「以杜解杜」的詮釋方法，即使是關於當時的社會情形，馮至也大量引用杜詩，更願意相信杜詩的記載更為真實，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推求杜甫的生活與環境，更能發掘他所表現的世界。³³洪業更認為，《新唐書·杜甫傳》幾乎沒有一段是正確的記述。³⁴然而，若從新舊《唐書》的〈杜甫傳〉中尋覓端倪，讀者應可發現兩傳的主幹，確實符合傳記文類的基本準則。

三、重讀〈杜甫傳〉：狂放不檢的文人典型

傳記的價值不僅在於事實，也在於鮮明的人物形象和合理的虛構想像。在正史裡頭紀傳互為表裡，歷史和人物是兩種不同的分工。劉知幾（661-721）認為：「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³⁵《史通》對紀傳體的看法，從一個側面解釋列傳重視人物形象，不著重歷史背景的性質。

美國學者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 1943-）曾對《舊唐書·李白傳》作詳細解讀，文章先從中國正史傳記的基本結構，如姓名、籍貫、世系、母親角色、傳主性格的評述、科舉中選的時間、仕途、言行、謚號、子孫等等開始。通過仔細的閱讀，倪氏發現〈李白傳〉的結構與上述的傳記要素並不一致，而且充斥著後來學者證實的許多錯誤。作者認為，如果這不是歷史編纂方面的問題，或許可以說，「李白是謫仙人」這個想法，通過〈李白傳〉的撰述方式而得到進一步的確立。³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指出，正史列傳提供讀者訓誡和實例，本紀和列傳的差異，在於前者用以編年、顯示朝代的盛衰及皇帝的行為，後者則展示出官員或傳主的品行。被選在正史之中的，都是史臣認

³² 同註12，前記頁3、頁136。

³³ 同註10，頁188-189。

³⁴ 洪業撰，陳廣湘箋注：《我怎樣寫杜甫》（香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8年），頁20-24。

³⁵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2，〈列傳〉，頁46。

³⁶ 倪豪士：〈對《舊唐書·李白傳》的解讀〉，載《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54、265-268。

定能代表一個朝代的人物，給讀者提供助益。³⁷循著前人學者的思考，事實的錯誤無疑是重大缺失，卻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寫作意圖和表達主題，更應該注意列傳能否配合傳主作品，互相闡發題旨。

是否如現代傳記作者所指出的，兩書〈杜甫傳〉毫無探討的價值？在正史的脈絡中，我們可以讀到一個怎樣的形象？

兩《唐書》的〈杜甫傳〉，開首主要交待杜甫的出仕經過：

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³⁸

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³⁹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的行文較《舊唐書》簡單：「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⁴⁰比較兩個版本，可見〈墓係銘〉的文字簡略，《舊唐書》的描述，深化了杜甫前赴河西謁見肅宗的情節，杜甫忠君或積極入世的形象較前突出。相似的敘述亦可見於《太平廣記》，讓人意外的是，人稱「詩聖」杜甫的段落置於「輕薄」之中，奔赴行在的一節卻未見收錄。《新唐書》對杜甫的評價，或可從《太平廣記》那裡窺見一斑。⁴¹杜甫出仕僅一年餘，因為房琯兵敗一事辯解引起肅宗大怒，兩《唐書》的記載如下：

³⁷ 同註 20, p. 102;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2-63, 77-82.

³⁸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

³⁹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201，〈杜甫傳〉，頁 5736-5737。

⁴⁰ 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載楊軍（1944-）撰：《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陝西：三秦出版社，2008 年），頁 209。

⁴¹ 參章群：《通鑑、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91-92；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265，〈輕薄一·杜甫〉，頁 2074-2075。

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⁴²

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然帝自是不甚省錄。⁴³

〈墓係銘〉只作「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⁴⁴「直言」自然是為逝者諱而已。同樣，《新唐書》也較《舊唐書》詳細，備敘房杜二人的關係、房琯失官的兩大原由、杜甫的上疏內容、肅宗的反應等，甚至指出這是杜甫仕途崎嶇不平的起因。覽《冊府元龜》的記述，杜甫的奏章「詞旨迂誕」：「韋陟，肅宗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帝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⁴⁵杜甫經歷了仕途的一次波折後，正史記載他被肅宗疏遠後的遭遇，兩《唐書》的記載頗不同，兒女餓死與出仕華州司功參軍兩事的次序對調：

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梔，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⁴⁶

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⁴⁷

有關杜甫這段事跡，陳文華已考之甚詳，兒女餓死一事，是將奉先之事附錄於此，子美棄官與饑荒並無關聯，較大可能是有感於政治氣氛不利，唯有選擇自退。⁴⁸也有學者提出各種說法，如杜甫對政治失望、擅離職守、官多人少的緩衝手段等等。⁴⁹

⁴² 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

⁴³ 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7。

⁴⁴ 同註 40，頁 209。

⁴⁵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522，〈憲官部十一·謫讓〉，頁 6ab，總頁 1364。鄧小軍對房琯罷相、杜甫獲罪兩事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是由於肅宗聽信濁流士大夫的讒言引致。見〈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歸鄜州考——兼論唐代的制敕與墨制〉，《杜甫研究學刊》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14-20；2003 年第 2 期（2003 年 6 月），頁 12-20。

⁴⁶ 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

⁴⁷ 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7。

⁴⁸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99-120。

⁴⁹ 韓成武、韓憫英：〈也說「罷官」與「棄官」——與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離開華州任的原因〉，《天

值得讀者注意的是《新唐書》的說法及用字。杜甫得到肅宗許可前赴鄜州，雖然出任華州司功，未幾卻「輒棄官去」，後來召任京兆功曹，亦不至。客居秦州之時，杜甫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成都。王洙（997-1057）〈杜工部集序〉似為原文，曰：「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椶，餽糶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⁵⁰兩《唐書》中的杜甫實在頗為不堪，一事無成的形象尤以《新唐書》為甚。〈杜甫傳〉的另一樁公案，則為杜甫與嚴武之間的關係，這一節都是歷來學者重視的焦點：

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畷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⁵¹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⁵²

兩《唐書》詳細交待嚴武如何厚待杜甫、杜甫性格上的缺點、嚴武死後杜甫的境況等。重讀兩篇〈杜甫傳〉，對杜甫充滿敬意的讀者，或會訝異於正史對杜甫的評價，「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褊躁傲誕」等等，均與文學史和詩歌中的杜甫大相徑庭。然而有趣的是，後來評論〈杜甫傳〉的歷代學者，主要就杜甫與嚴武的關係展開討論，幾乎無一回應「褊躁傲誕」等評語。陳文華考訂杜嚴二人的交情時，嘗試探索任華（生卒不詳，約與杜甫同時）〈雜言寄杜拾遺〉詩中的杜甫形象。在質疑杜甫

水師範學院學報》25卷3期（2005年6月），頁49-51、75、王勛成（1945-）：〈杜甫罷官說〉，《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卷2期（2004年3月），頁23-26、閻琦（1943-）：〈杜甫華州罷官西行秦州考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卷2期（2003年5月），頁88-93。

⁵⁰ 王洙：〈杜工部集序〉，載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附編，頁2239。

⁵¹ 同註38，卷190下，〈杜甫傳〉，頁5054-5055。

⁵² 同註39，卷201，〈杜甫傳〉，頁5737-5738。

是否狂放如此的同時，也同意「從來研究杜甫的，於李肇所述杜甫對嚴武不禮之事，並未加以否定過，這固然是往後有越來越多的資料敘述類似的事件，而難以推翻，但任華此詩的影響力，也應該是確切可見的」。⁵³

賴瑞和（1953-）指出，杜甫因奔行在獲授左拾遺，雖然品秩僅從八品上，卻因近侍於皇帝左右而屬於清貴官職。拾遺要求品行高潔、文字優美的文人擔任，可算是唐代的中層文官。後來杜甫在蜀出任「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檢校某某員外郎」亦是唐代常見的職務。以方鎮的幕官而言，帶「試」（如「試校書郎」）銜者為低層官員，若掛「檢校某某員外郎」的，可謂已進入中層。杜甫更獲「賜緋魚袋」，這其實說明他的官運不壞，只是釋褐年齡相對較晚，不免有白首拾遺的感慨。⁵⁴

正如倪豪士所言，《舊唐書》中的李白以「醉死」終，這種不尋常的死法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表述而是修辭技巧，以「醉死」暗指李白「縱酒」。⁵⁵杜甫的死法，和李白一樣是讓人詫異的：

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⁵⁶

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⁵⁷

關於杜甫之死，自然已有許多學者否定兩書之說，當中不少看法，純粹以為餓死斷不似詩聖所為，同時亦有讀者相信《唐書》記載，並不認為影響詩聖的地位。上述三部現代傳記，只有朱東潤保留餓死說；⁵⁸有些傳記作家將傳主的死期一刻作為一生故事的總結，⁵⁹馮至就以詩人筆觸敘述杜甫的死與社稷的關係——「他看他的死期已經臨近，北歸是不可能了。在這情況下，他並沒有忘記國家的災難」。⁶⁰我們或許可以用另一種角度考慮：正史

⁵³ 同註 48，頁 159。

⁵⁴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頁 111-125、150-151、228-230；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郎官〉，《唐史論叢》第 10 輯（2008 年 2 月），頁 106-110。

⁵⁵ 同註 36，頁 264。

⁵⁶ 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5。

⁵⁷ 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8。

⁵⁸ 朱著保留餓死之說，謂「牛肉白酒之致死，和旅殯岳陽，不妨並存」（同註 24，頁 189）。

⁵⁹ **Hermione Lee** (1948-), *Virginia Woolf's Nose: Essays on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8.

⁶⁰ 同註 12，頁 203。

所建構的杜甫，表現出一個狂放不自檢的杜甫，這段事跡與上面杜甫好酒的性格、他的宦宦生涯、登嚴武牀等事件一以貫之。新舊《唐書》均用了詳細篇幅敘述杜詩的藝術成就，倒是在開始前，兩書都以李杜二人對照，出現一個形象不堪的詩聖：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甫有文集六十卷。⁶¹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⁶²

同樣，「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一段，因為術語「詩史」在宋代(960-1279)以後廣泛流傳，杜詩被認為是信史，以致文人學士多數略過不談。我們還可發現，《新唐書》的「詩史」論述，只局限於詩藝，並無包括史實、史料的概念在內。⁶³究其原因，《舊唐書》的文苑傳將李白、杜甫等偉大作家置於爵位崇高的文人以外，期望「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⁶⁴《新唐書》的文藝傳謂「文學為下科」，因為無論君子小人，只要是能者即可獲得。然而中材之士，有的「恃以取敗」，有的「朋姦飾偽」，相反，君子則能以功業行實揚名，或能「闡釋優游」，不致怨望訕國。⁶⁵

整體而言，兩《唐書》對杜甫的評價相近，通過以上細讀，我們可見兩傳中只有「挺節無所汙」及「律切精深」等較合符詩聖的身份，無論是提拔出任左拾遺、與肅宗的關係、棄官、與嚴武的交往、飽醉一夕暴卒及李杜比較等等母題，均在編織一個不黯做官、刻苦、自制能力甚低的優秀詩人的印象，也因此新舊《唐書》才多番稱其「恃恩放恣」、「無拘

⁶¹ 同註38，卷190下，〈杜甫傳〉，頁5055-5057。

⁶² 同註39，卷201，〈杜甫傳〉，頁5738-5739。

⁶³ 詳參拙著：〈杜甫「詩史」定義的繁衍現象〉，《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年6月），頁189-220。

⁶⁴ 同註38，卷190上，〈文苑·上〉，頁4982。

⁶⁵ 同註39，卷201，〈文藝·上〉，頁5726。

檢」。若翻閱其他筆記小說，杜甫文而不貴、不擅營生的一面並非罕見，例如荒誕不經的《雲仙雜記》，這些傳聞予人的印象與新舊《唐書》相去不遠：

杜甫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史，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壘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 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

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⁶⁶

賴瑞和借《新唐書·吳保安傳》為例，說明小說與正史的關係。對史家而言，小說「異聞」能使整個敘事更為生動完整。較重要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有大量的正統史料，引用小說的原因只是陪襯。至於〈忠義傳〉、〈列女傳〉等「軟性」的小人物，史官則有可能完全引用小說文獻以撰寫傳記。⁶⁷〈文苑傳〉的情況，恐怕介乎以上兩類之間：一方面它既因為「文學為下科」的思想影響而創造這種角色，另一方面有關杜甫的早期文獻，也大都以「苦」、「狂」、詩歌藝術為主，⁶⁸正史與這些記述還是頗為接近的。

從傳記元素來看，兩書〈杜甫傳〉清晰地構築傳主的人物形象，作為一個狂放不檢的詩人，一個生活落魄的文士，傳中杜甫的性格無疑是飽滿的。除了一些明顯的錯誤（如舊傳「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外，正史的許多記載，包括對肅宗的態度、多次棄官和嚴武的形象等重要細節，目前仍未有充分證據可予否定。正史杜甫傳的貢獻不全在於史料，而應著眼於形象的建構，或者說，鮮明形象的合理虛構。

兩《唐書》雖然屬於啟人疑竇的記載，卻饒富興味的，多種杜詩注本均收錄兩傳於文集卷首，一方面編注者的態度十分保留，另一方面卻又必須編選這兩份有官方地位的文獻。宋代以後，杜甫傳記的著述不多，僅有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杜甫》，大體上也以新傳為底本。⁶⁹從形象構建的角度看，唐以後的作家，有不少歌詠草堂、杜甫像和讀杜

⁶⁶ 唐·馮贇著，齊仕蓉校注：《雲仙雜記校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卷1，頁8、11-12、卷3，頁68。以上引文亦見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703。

⁶⁷ 賴瑞和：〈小說的正史化：以《新唐書·吳保安傳》為例〉，《唐史論叢》第11輯（2009年2月），頁343-355。

⁶⁸ 詳參華文軒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53。

⁶⁹ 孫映達校注：《唐才子傳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卷2，頁202-204。

詩的創作，⁷⁰這些作品著重描繪杜甫的豪、詩藝高超和窮苦的坎坷人生，其中，清代（1616-1912）程可則（1624-1673）的〈題杜少陵畫像〉有一定傳記成分，可為兩傳的注腳：

杜陵老叟生絕奇，蒼髯面英雄姿。似茲不合久貧賤，曷為坎壈長歎歎。自從大禮獻三賦，尉授河西不肯赴。當宁何曾解愛才，旅食京華歲虛度。忽然鞞鼓動長安，玉輦西遊蜀道難。奔走三川寄家室，脫身賊壘多辛酸。麻鞋謁帝趨靈武，拾遺侃侃居言路。直節何妨掾友生，諫書反得君王怒。牢落天涯到秦州，負薪拾橡窮且愁。微官棄去亦何恨，可憐事業付沙鷗。劍南直入嚴武幕，散發戎渝致非惡。春流無恙下夔門，秋色蕭然臥西閣。晚年出峽望衡山，楚水茫茫潭岳間。酒酣志仰天哭，咫尺襄樊那得還。一生落拓無窮已，獨有豪吟詠詩史。同時比肩惟太白，後來作者紛誰是。鄢陵先生絕世雄，讀書萬卷身乘驄。稱詩酷擬草堂作，沈鬱頓挫將無同。昔年作吏向秦國，工部祠堂拜顏色。傳與先賢作畫圖，曠代風流盡相識。嗟哉！杜陵一沒已千秋，吾徒仰止空悠悠。先生望古有殊契，神交豈直形像謀。我亦幼齡重高詠，乞將粉本歸南州。⁷¹

顧名思義，程可則先從杜甫的不凡外貌開始描述，過渡到下文教人歎歎的命運。這篇接近傳記的詩作，從杜甫獻賦一事展開，一直敘述到飄泊天地之間的末路。作者的角度，大致屬於「詩聖」地位確立以後的典型視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程可則視「豪」為聯繫偉大詩人及其作品的中介。相對於一生落泊的窮愁，「豪吟詩史」足以令杜甫獨步古今，「豪」的評價也與兩傳有相通之處。

延續前文，後世有關杜甫傳記和詩聖形象的討論，自宋代以來就有廣泛而全面的探索。清代的重要注家，舉如錢謙益（1582-1664）、仇兆鰲、浦起龍和楊倫（1747-1803）的詮釋，均建基於兩《唐書》杜甫傳的修訂和年譜編撰之上。由於兩傳的錯誤極多，足以說明杜甫這個詩人的細節，例如不拜河西尉、棄華州官、與嚴武關係和餓死等說，不是被強烈否定，就是在年譜中保留的同時遭到忽略。例如，仇注以為舊傳「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一句應刪，又指新傳中嚴武殺人一事不甚可信。⁷²不拜河西尉、短暫出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棄華州官、請辭嚴武幕府等等，均可說明杜甫主動離職的心態，不甚適應仕宦的人生。

⁷⁰ 同註 50，〈諸家詠杜〉，頁 2257-2317。

⁷¹ 同註 50，〈諸家詠杜〉，頁 2313。

⁷² 同註 50，〈舊唐書本傳〉、〈新唐書本傳〉，頁 3-6。

正因正史的失誤，注家傾向以作品重組杜甫的形象，懷疑兩傳中負面敘述的可靠性。例如，周樽（生卒不詳，與楊倫同時）認為杜甫才識過人，《新唐書》杜甫傳的看法，只是宋祁沒有識見，對杜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評價深感不以為然。無論是一飯未嘗忘君、議論見解等等，杜甫自云「致君堯舜」、「再使俗淳」並非虛言。⁷³畢沅（1730-1797）的序文，將杜甫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忠孝仁義，嫻熟經史百家之書，更通天地古今之變化。杜詩「不可注，亦不必注」，⁷⁴遠遠凌駕於世上各種著述之上。馮至和洪業兩部傳記中（正面的）杜甫形象，可謂其來有自。

後來撰寫杜甫傳記的作家，對正史〈杜甫傳〉的評價偏低，不甚同意傳中建構的杜甫形象，認為杜詩是更為可靠的傳記材料。那麼，從杜甫的自傳詩中，我們可以獲得哪一個作者觀照自身的形象？

五、杜甫的自傳詩：悲憤詩與自傳詩比較

評論家指稱杜甫的自傳詩數目非常可觀。據謝思煒的看法，杜甫的自傳作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他的全部作品，第二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等）為人生經歷中的回顧，第三類（〈壯遊〉、〈昔遊〉等）為晚年總結自己一生的長篇。他認為，後兩類作品可以說明杜甫是一個自覺的自傳詩人，〈詠懷五百字〉、〈北征〉、〈壯遊〉等作，深入作者自己的人生，將所發生的事件和生活中的世界轉化成自身感受，自傳詩所傳達的，是最真切的悲劇體驗。⁷⁵川合康三引用謝思煒的分類，指出第三類作品〈壯遊〉集中於自身，一個風華正茂、對自己未來人生充滿信心的少年，陸續經歷求仕不成、安史之亂等挫折，備極艱辛，落得老病客殊方的下場。川合康三讚賞第三類的自傳型作品，謂其突顯了作者過去和現在巨大的改變。這是一種作者把自己客體化的寫法，作為一個普通至極的低下層官員，杜甫展現出一個無可取代的、輪廓鮮明的人物，下啟中國自傳詩的傳統。杜甫經常以「杜陵野老」、「少陵野老」等衰弱與窮困的第三人稱角度描寫自己，這種自謙、自我嘲諷的形象將自我漫畫化。川合

⁷³ 清·周樽：序，載清·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6。

⁷⁴ 清·畢沅：序，同前註，頁1。

⁷⁵ 謝思煒：〈論自傳詩人杜甫——兼論中國和西方的自傳詩傳統〉，載《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6-8。

康三特別提到「中國第一首自傳詩」——蔡琰（170?-?）〈悲憤詩〉的寫作技巧相當戲劇化，有秩序的對句形式，和混亂無序的戰亂情況，予人提煉刻劃過度的感覺。⁷⁶

論者標舉〈詠懷五百字〉等長篇自傳詩「以杜解杜」，藉此揭示杜甫的一生。細讀杜甫第一首長篇大作〈詠懷五百字〉，詩歌詳述作者的身份（杜陵有布衣）與家庭狀況（幼子餓已卒）、自己的形象（特別是白首契闊、沉飲自遣的一面）、敘述自己回家的艱辛經過、自述（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他人（取笑同學翁、顧惟螻蟻輩）、君臣的關係和規諫（生逢堯舜君、君臣留歡娛）、富人與平民百姓的對比（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⁷⁷蔡琰〈悲憤詩〉敘述東漢（25-220）末年董卓（?-192）引胡亂華（董卓亂天常），作者為胡人所虜（輒言斃降虜），去國多年（哀歎無窮已）。詩的高潮放在主人公獲赦回到中原（已得自解免），與自己在異地出生的兒子訣別的場景與對話（兒前抱我頸）。末尾敘說自己回到中土時所見的荒涼景象（出門無人聲），以及對將來的憂慮（常恐復捐廢）。⁷⁸比較兩首作品，語調、材料、組織等各方面，〈詠懷五百字〉與〈悲憤詩〉有極其相似的地方，葉嘉瑩謂杜甫很可能受了蔡琰詩的影響，不同之處是前者更重視整個國家和人民的幸不幸。⁷⁹謝思煒認為〈詠懷五百字〉側重內在精神過程的描述，社會情況主要是對自我的刺激，推進情感和思想的升華。⁸⁰如果說〈悲憤詩〉是一首過分「類型化」的作品，削弱了自傳最重要的「個人」性格的話，〈北征〉、〈往在〉、〈夔府詠懷一百韻〉、〈夔府書懷四十韻〉等巨製，都屬於「悲憤詩」的類型模式。

這些作品先從某個時空的自身經歷開始。至德二年（757），杜甫獲肅宗批准，前往鄜州探望妻兒（〈北征〉），作者回憶自己拒不赴任河西尉，年過半百才得以出任工部員外郎（〈夔府書懷四十韻〉）。長安淪陷之日，宮殿裡的妃嬪為安史亂軍殺戮的慘象（〈往在〉），身處夔州白帝城邊，老病異鄉，患有消渴症已有三年之久（〈夔府詠懷一百韻〉）。其次，「悲憤詩類型」多數有一段長篇的敘述，說明撰寫作品當下的情狀或情節，如〈北征〉寫到敘述者回家途中所見，對於戰場、白骨的感嘆，與〈悲憤詩〉的內容與思想感情實在非常接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⁸¹

⁷⁶ 川合康三（KAWAI Kōzō）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頁157-163、〈杜甫詩中的自我認識與自我表述〉，載陳文華主編：《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81-94。

⁷⁷ 同註50，卷4，頁264-273。

⁷⁸ 蔡琰：〈悲憤詩〉，載遼欽立（1910-1973）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頁199-200。

⁷⁹ 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4。

⁸⁰ 同註75，頁11。

⁸¹ 同註50，卷5，頁397。

當然，更重要而且明顯的，就是「悲憤詩類型」強調個人與社會極強的聯繫，特別是國家面臨改弦易轍的危機之際，敘述者深深感受到個人的渺小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詩作最後一般以對國家的期盼或告誡（〈夔府書懷四十韻〉：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或惶惶不可終日的哀嘆結束（〈詠懷五百字〉：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⁸²

正如川合康三所言，中國的自傳文學沒有西方自傳的懺悔意識，與西方自傳的另一差異是，中國的自傳裡個人與時代關係極為密切，有時時代（社會）的重要性甚至在個人之上。〈夔府書懷四十韻〉、〈往在〉、〈昔遊〉等詩雖然有自傳性質和人生經歷的回顧，重心卻仍然放在人世的變遷。反之，從中國自傳文學和自傳詩的發展角度看，〈壯遊〉將焦點集中於自身，較其他作品更具意義。⁸³回到勒熱訥的定義，自傳最重要的元素是總結和認識自己。雖然〈詠懷五百字〉、〈北征〉、〈夔府書懷四十韻〉等有許多提及自己的敘述，卻欠缺自我認知和形象的說明。悲憤詩的創作模式最著重時代的苦難，歷史背景遠較「我是誰」重要。悲憤詩的事實不比自傳詩的更接近客觀現實；詩歌類型本來就是一種虛構手法。和悲憤詩不同，自傳詩最重視四種角度中的自我變化，翻閱杜詩，首推〈壯遊〉能符合這種嚴格意義的自傳詩類型的作品。通過自傳詩的嚴格定義，不僅能了解自傳文學史的發展，讀者也能領會杜甫如何理解自己的一生。

王嗣爽（1566-1648）、浦起龍皆謂本詩為作者列傳，趙次公（生卒不詳，約12世紀在世）更云：「公之平生出處，莫詳於此篇，而史官為傳，當時之人為墓誌，後人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書之，甚可惜也！」⁸⁴歷來注家重視年譜之學，多種杜工部年譜均引述〈壯遊〉，特別是史料缺乏的早年生活。⁸⁵

與上述作品的開首不同，〈壯遊〉一開始從作者自己的童年開始，回憶少年時代的經歷：⁸⁶

⁸² 同註50，卷4，頁273；卷16，頁1426。

⁸³ 川合康三（KAWAI Kōzō,）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頁3、161。

⁸⁴ 明·王嗣爽：《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8，頁257、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1之5，頁162、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注：《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戊帙卷之10，頁1190。

⁸⁵ 例如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0，頁716-736、清·朱鶴齡輯注，韓成武、孫微、周金標、韓夢澤、張嵐點校：《杜工部詩集輯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5-19、同註73，附錄，頁1141-1152。

⁸⁶ 同註50，卷16，頁1438-1446。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浦起龍云本段「寫得目空一世，自少而然」，⁸⁷正說明了作者是如何審視自己的童年的。前半寫杜甫從小就天才橫溢、文思泉湧，得到當時文士的稱讚，許之以班固（32-92）揚雄（前 53-18），後半寫自己豪邁、好酒、嫉惡如仇，又從兩事說明狂傲的性情：與同輩相距甚遠，結交的多數是年長之人；酩酊大醉的自己自視甚高。趙次公認為前十四句「敘述其為學、為性之事」，⁸⁸楊倫注「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幾句，就認為「公幼時便不可一世乃爾」，⁸⁹正可說明本段極有自傳意義，表現出作者期望構築的形象，後來的評論者十分認同杜甫給予自身的定義。勒熱訥就指出，童年的內心經歷是判斷自傳的重要依據。⁹⁰緊接著，極其鋪張的文筆敘述遊歷吳越的經過，「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等詩句，展示作者豪邁的性情：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閩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大伯，撫事淚浪浪。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壯遊〉第三段重新描繪一幅游俠圖：

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鵝鶩。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疆。

浦起龍、楊倫皆謂本段極有俠客氣味。⁹¹少陵自比屈（原，前 340？-前 278？）賈（誼，前 200-前 168）曹（植，192-232）劉（楨，？-217），而用「獨辭」、「放蕩」、「清狂」、

⁸⁷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1之5，頁162。

⁸⁸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注：《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戊帙卷之10，頁1190。

⁸⁹ 同註73，卷14，頁697。

⁹⁰ 同註7，頁8-10。

⁹¹ 同註87，卷1之5，頁162；同註73，卷14，頁698。

「春歌」、「冬獵」、「逐獸」等詩文，皆在描寫放浪的自畫像。第四段，杜甫繼續大書「快意」、「曳裾」、「痛飲」。有關不拜河西尉一事，作者更謂「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⁹²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車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從本段開始，詩的氣氛慢慢變得沉重，「朱車任傾奪，赤族迭罹殃」下啟第五段安史之亂的敘述：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貙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

第六段形容現在的情況。相對詩的開端，現在的自己無法振翅高飛，然而詩的結尾，杜甫還是期望將來人材為國效力，顯示出他忠君愛國的精神：

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鷗夷子，才格出尋常。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閱覽全首自為列傳的作品，晚年杜甫是以「狂」、「豪」為自己早年的生活定位。參考勒熱訥的分析，自傳中的敘述者，對以往的自己可能產生認同感或距離感。當敘述者面對無法彌補的距離而感到遺憾，就會產生懷舊的情感。⁹³〈壯遊〉的敘述者，顯然認同狂傲、豪放的青少年主人公，對過往的經歷（「壯遊」）無比眷戀，至於犯顏直諫、幾乎引致殺身大禍一事，也認為是其性格使然。無論是「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放蕩齊趙間，

⁹² 另參〈官定後戲贈〉：「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同註50，卷3，頁245。

⁹³ 同註7，頁68-70。

裘馬頗清狂」、「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等等，這些形象均與下文「斯時伏青蒲，廷靜守御牀」、「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的個性一脈相承。詩評家這樣分析詩的結尾：

結處壯心消盡，仍是壯心消不盡。

後文說到極淒涼處，未免衰頹，卻正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意，想見酒酣耳熱，擊碎唾壺時。……或謂前半不免有意誇張，是文人大言。要須看其反面，有血淚十斗也。⁹⁴

兩種說法都與杜甫的「狂」吻合。年譜之類研究多採用〈壯遊〉的事實，卻未有注意詩句間緊扣一個共同主旨，也就是自傳作品的關聯性。作者通過敘述的前呼後應，合理構築形象完整的自己。任華〈雜言寄杜拾遺〉頗能說明被疏遠後的杜甫，狂傲與前沒有兩樣：

英才特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為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壺。半酣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傍若無。古人制禮但為防俗士，豈得為君設之乎？⁹⁵

杜詩數量眾多，反映作者自我一面的作品不少，〈壯遊〉是形象最為完整的一篇，箇中細節和其他杜詩十分一致。例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杜甫同樣將自我客體化，極言自己「白頭亂髮垂過耳」、「手脚凍皴皮肉死」，形象和經歷十分淒涼。⁹⁶又如〈遣懷〉，杜甫鋪敘自己遊歷的經過，與高適（700?-765）、李白慷慨懷古的豪情，並提及唐朝開發西域，「獻捷不云輸」。然而，在最後作者感嘆國勢日衰，與此同時朋友散盡，只餘衰老的自己獨在天涯。⁹⁷顯然，〈遣懷〉的內容和〈壯遊〉相近，可資佐證作者的經歷；不同的是前者僅就部分片段進行回憶，沒有貫穿整個敘述的人物形象登場。

從一個特定回憶的時空開始，也是〈又上後園山脚〉的手法。在這首詩中，杜甫記載了自己遊歷東嶽的過去，也有不少個人的寫照，如「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讓後人得以了解作者的處境和病情。和悲憤詩相似，該作也點出國家窮兵黷武和民不聊生的慘狀，重點仍然是社會和個人的對照。⁹⁸〈壯遊〉所記載的事實，可以從杜甫的這些「心史」裡得以互證，更進一步的，〈壯遊〉突出了作者的個人形象，鮮明的個性躍於紙上。

⁹⁴ 同註 73，卷 14，頁 700-701。

⁹⁵ 任華：〈雜言寄杜拾遺〉，同註 50，附編，頁 2258-2259。

⁹⁶ 同註 50，卷 8，頁 693。

⁹⁷ 同註 50，卷 16，頁 1447-1450。

⁹⁸ 同註 50，卷 19，頁 1661-1663。

必須指出的是，〈壯遊〉的「狂」並非孤證，還有許多詩例包括「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樂遊園歌〉）、「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贈李白〉）、「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官定後戲贈〉）、「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等等，不一而足。⁹⁹杜甫的狂一直受到學者注意，已有多篇專文提及這個問題，例如保莉佳昭（HOKARI Yoshiaki, 1959-）引用〈狂夫〉一詩，謂杜甫「表面上是在嘲笑自我的『狂』，其實骨子裡確有他祇好自視為『狂』的苦惱，同時也有他對社會的不滿與反抗精神」。劉曙初（1975-）云儒道兩家有著狂的精神傳統，杜甫一方面體現道家對現存制度的否定和個人自由的追求，一方面保有儒家對道德和社會理想的執著。孟修祥（1956-）、董武（1955-）集中論述杜甫政治方面仕途失意、飄泊無定的狂，唐磊（1977-）比較李杜的狂，兩者的「狂」均包含盛唐詩人遠大的政治理想和桀驁不馴的性格，均具備高邁不馴的「清狂」和天真爛漫的「痴狂」，前者卻沒有後者的痛苦的「迷狂」。吳懷東（1966-）認為杜甫的狂在於藐視平庸、突破規範、對詩歌才能的充分自信、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政治的參與意識與政治自信。到了宋代，因為社會文化的變遷，他的狂傲一面有意無意被忽略了。¹⁰⁰

以上諸家說法主要從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展開，確為的論。在此基礎上推進，〈壯遊〉的意義在於從俯瞰的角度審視「狂」於杜甫的重要性：不僅是文化層面的或政治層面的原故，狂傲、豪放、忠君愛國和潦倒更屬於杜甫自我認知、貫徹個性歷史的核心，如果我們根據「以杜解杜」的立場理解杜甫，狂、豪、忠義與窮愁更應該是詩人的主要個性，這些特徵與正史〈杜甫傳〉一脈相承，是詩人為自己定義的角度。

六、結語

本文嘗試綜合過去的傳記研究，提出傳記必須平衡歷史、傳主、事實與虛構四種要素，其中傳主的個人形象和個性應屬最為重要的核心。過去的著述，較重視事實和背景，認為

⁹⁹ 同註50，卷1，頁42；卷2，頁102；卷3，頁245；卷9，頁743。

¹⁰⁰ 保莉佳昭（HOKARI Yoshiaki）：〈蘇軾詞裡所詠的「狂」〉，載《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6-67；劉曙初：〈論杜甫與中國狂士傳統〉，《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7卷1期（2005年1月），頁57-60；孟修祥、董武：〈論杜甫之狂、逸與禮佛〉，《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2000年），頁53-57；唐磊：〈略論杜甫之狂〉，《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2003年），頁60-62；吳懷東：〈自笑狂夫老更狂——論「狂」與杜甫文化精神〉，《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5卷5期（2004年9月），頁40-43。

這是一種「合理虛構」的方法，以求描畫傳主的「面孔」。事實上，從內緣的心史到外緣的傳記文獻資料來看，詩聖的形象和現代人的理解頗不一致。

杜甫本人將自我以他人的角度鋪寫，認為狂豪剛直、鬱鬱不展是其真實寫照，足以總結自己的前半生。閱讀詩聖的心史，我們既能發現他在詩歌體裁的繼承與創新，也可看到一個既自信滿滿而又憂慮萬分的主人公。杜甫作品風格廣泛，長篇鉅製是深受後世稱譽的重要系列，我們應注意其中悲憤詩和自傳詩兩種類型的差異，從而更準確地理解杜詩。〈夔府書懷四十韻〉、〈詠懷五百字〉等作發展蔡琰〈悲憤詩〉的模式，對時事和災難的刻劃是這些作品的旨趣，詩中作者或敘述者的經歷，以渺小個人襯托時代黑暗。以〈壯遊〉為首，杜甫另一類回顧半生的自傳體作品，為讀者提供極有價值的自我形象。

五代（907-960）及宋，正史雖然引用大量來源有待證實的素材，言辭也偏於負面，仍意在發掘一個狂傲挺節的文人角色，從根本上說與他的自傳、同代詩人的記錄和唐代筆記小說文獻一致。就此而言，文藝傳和筆記小說的研究價值未能輕易抹殺。

由於寫作背景的影響和不同讀者群的需要，現代傳記講述杜甫的一生，同樣根據一千四百多首「心史」為底本，卻考掘出許多迥異的細節，鋪陳一個忠孝仁德為主線的主人公，對照處於戰亂的黑暗時代。傳記作者當然可以描繪心目中不同的作者面貌，然而卻可能與「以杜解杜」、「以杜證杜」的原則不符。以嚴武和杜甫的關係為例，現代傳記作家更像是為了歌頌詩聖的偉大人格，而故意貶低嚴武的品德。

可以想像，面對如此豐富的素材，傳記角度必將仍然是許多學者認為正統的研究方法，是理解杜甫的重要入門手段。如果我們相信「以杜解杜」、「以杜證杜」是最合理的閱讀策略，狂、豪、忠君與潦倒是傳主的主要形象，這些首要屬性的探討，將有助杜詩教學，並重新釐定傳記/評傳的寫作方針。若試圖從傳記方法理解杜甫，狂豪與悲慘人生應是落墨的一環，若從評傳的角度看，它更應該是一部「風格的故事」。¹⁰¹

¹⁰¹ John Richetti, "Writing About Defoe: What is a Critical Biography?" *Literature Compass* 3.2 (2006), p. 78.

徵引文獻

古籍

-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注：《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唐·孟棻等撰，李學穎標點：《本事詩·續本事詩·本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唐·馮贇著，齊仕蓉校注：《雲仙雜記校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
- 唐·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明·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清·朱鶴齡輯注，韓成武、孫微、周金標、韓夢澤、張嵐點校：《杜工部詩集輯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清·黃宗羲：《南雷文定》（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近人論著

- 王助成：〈杜甫罷官說〉，《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卷2期（2004年3月），頁23-26。
- 左漢林、趙志強：〈論杜甫傳記寫作的新方法與新角度——韓成武先生《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讀後〉，《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6卷6期（2004年11月），頁19-21。
- 朱文華：《傳記通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
- 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 * 朱東潤：《杜甫敘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吳懷東：〈自笑狂夫老更狂——論「狂」與杜甫文化精神〉，《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5卷5期（2004年9月），頁40-43。

- 李芳：〈英語世界中的第一部杜甫傳記——弗勞倫斯·艾斯庫的《杜甫：詩人的自傳》〉，《新世紀圖書館》2007年卷3期（2007年5月），頁81-84。
- 李健：〈論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的「史傳合一」與西方傳記的「史傳分離」〉，《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2007年），頁84-87。
- 周助初主編：《唐人軼事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孟修祥、董武：〈論杜甫之狂、逸與禮佛〉，《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2000年），頁53-57。
- 林東海：〈朱東潤先生和《杜甫敘論》〉，收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編：《朱東潤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28-131。
- 柳存仁：〈讀洪煨蓮著杜甫傳〉，載《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669-1684。
- 洪業撰，陳廣湘箋注：《我怎樣寫杜甫》（香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8年）。
- 唐磊：〈略論杜甫之狂〉，《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2003年），頁60-62。
- 孫映達校注：《唐才子傳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 莫礪鋒、童強：《杜甫傳：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 *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章群：《通鑑、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馮至：〈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載《馮至選集》，卷2（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186-190。
- * 馮至：《杜甫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
- 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杜甫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華文軒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楊承祖：〈杜甫傳記研究中的畸變〉，收入林天蔚、黃約瑟主編，《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之二》）（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年），頁81-90。
-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陝西：三秦出版社，2008年）。
- 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黃自鴻：〈杜甫「詩史」定義的繁衍現象〉，《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年6月），頁189-220。
- 劉曙初：〈論杜甫與中國狂士傳統〉，《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7卷1期（2005年1月），頁57-60。
- 鄧小軍：〈杜甫疏救房瑄墨制放歸鄜州考〉，《杜甫研究學刊》2003年第1期（2003年3月），頁14-20、2003年第2期（2003年6月），頁12-20。
- 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郎官〉，《唐史論叢》第10輯（2008年2月），頁106-119。
-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年）。

- 賴瑞和：〈小說的正史化：以《新唐書·吳保安傳》為例〉，《唐史論叢》第 11 輯（2009 年 2 月），頁 343-355。
- 錢志熙：〈均衡地作用——讀馮至先生《杜甫傳》的一些體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4 期（1994 年），頁 34-35、55。
- 閻琦：〈杜甫華州罷官西行秦州考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 卷 2 期（2003 年 5 月），頁 88-93。
- 謝思煒：〈論自傳詩人杜甫——兼論中國和西方的自傳詩傳統〉，載《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17。
- 韓成武：《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韓成武、韓軾英：〈也談「罷官」與「棄官」——與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離開華州任的原因〉，《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5 卷 3 期（2005 年 6 月），頁 49-51、75。
- （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年）。
- （日）川合康三：〈杜甫詩中的自我認識與自我表述〉，收入陳文華主編，《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81-94。
- （日）保荊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法）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
- （美）韋勒克（René Wellek）、（美）沃倫（Austin Warren）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
- （美）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德）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著，馬樹德譯：《〈管錐編〉與杜甫新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Denis, Twitchett.**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in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95-114.
-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I: 10.1017/CBO9780511572678.010
-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Essays on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ohn, Richetti.** "Writing About Defoe: What is a Critical Biography?" *Literature Compass* 3.2 (2006), pp. 65-79. DOI: 10.1111/j.1741-4113.2006.00302.x
- 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 *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9).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Wen-hua. *Du Fu Zhuanji Tang Song Ziliao Kaobian*.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87.
- Du, Fu & Qiu, Zhao-ao. *Dushi Xiangz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9.
- Du, Fu & Yang, Lun. *Dushi Jingqu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2.
- Feng, Zhi. *Du Fu Zhuan*. Tianjin: Baihua Wenyi Chubanshe, 2007.
- Hung, William.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9.
- Liu, Xu, et al. *Jiu Tang 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5.
- Ouyang, Xiu & Song, Qi. *Xin Tang 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5.
- Pu, Qi-long. *Dudu Xinji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1.
- Zhao, Bai-sheng. *Zhuanji Wenxue Lilu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3.
- Zhu, Dong-run. *Du Fu Xulun*.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06.

“Restructuring the face of Du Fu: A Retrospective Reading from Modern Biographies to ‘the History from the Heart.’”

Wong, Chi-hung

(Received January 10, 2014 ; Accepted April 25, 201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etry-history” and “to explain Du from his own poetry,” commentators believe that Du Fu’s poetry is more reliable than the Old and New Books of Tang. According to his poetry, one can reconstruct Du’s life and his background,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An Shi Rebell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key concepts of the biography, and to re-evaluate the study of biographies of Du Fu by analyzing three modern biographies, re-reading the official records and investigating Du Fu’s autobiographical poetry. In “the Great Journey,” the poet concludes himself as “eccentric,” “unrestrained,” and failure in career; in the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the two Books of Tang, although the sources are dubious, an image of an unrestrained man of letters, the same as that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is exhibited. Due to the different writing backgrounds and the various needs of readers, modern biographical writers have discovered different faces of Du Fu from the same work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icture of “eccentric,” “unrestrained” and “miserable” should be the primary portrait of a biography of Du Fu.

Keywords: Du Fu, biography, “history from the heart,” the genre of poetry of sadness and anger, “the Great Journey”

